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吴湘玲,李静.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非遗政策优化路径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8(2): 29-36.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非遗政策优化路径研究

吴湘玲 李静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旨在保护、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自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遗政策在保护、合理开发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家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随着公共文化服务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非遗政策面临新的要求,包括提升服务品质、促进城乡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开放共享及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未来,应通过构建标准化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破除管理障碍等路径优化非遗政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并为文化强国战略提供支持。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融合发展;开放共享

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2-0029-08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1],将文化强国建设摆在当前工作的重要位置。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将在未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2]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作为一种体现社区、群体以及个体文化创造力的公共文化^[3],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服务功能,其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不仅关乎文化遗产的延续,更直接影响民众对高质量、特色文化服务的需求满足。^[4]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质量服务,离不开非遗政策的有效保障。^[5]由此,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背景下,正确认识并总结我国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称《保护公约》)以来的政策成效与不足,探讨非遗政策优化的着力方向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遗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助推器。

二、加入《保护公约》以来我国非遗政策的成效与不足

自加入《保护公约》以来,我国的非遗保护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在政策推动与长期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现行非遗保护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

收稿日期:2025-02-20

基金项目:湖北思想库课题“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研究”(202008024);湖北省高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新文科建设视阈下中国行政管理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2022014)

第一作者简介:吴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教授,主要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政策研究。

通信作者:李静(1989-),女,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政策研究,E-mail: iris-li@whu.edu.cn.

(一)非遗保护政策进程中的成效与不足

我国的非遗保护政策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体现出不同的政策重点和保护措施。

第一个阶段可概括为抢救性重点保护阶段(2004~2010年)。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公约》,标志着我国正式融入国际非遗保护框架。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此后,我国政府启动了抢救性重点保护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自2006年起,我国开始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不同级别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申报机制促发了全国各地争相竞报的热情,抢救性地保护了大批非遗重点项目。此外,国家各部委相继出台政策,针对老字号、昆曲等重点非遗项目开展保护工作。非遗抢救性重点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有序开展。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分类标准与长效管理机制,部分项目保护方式简单化或流于形式。某些濒危技艺虽得到及时记录和保存,但未能有效融入当代生活,造成“保护即消亡”的现象。

第二个阶段为整体性保护阶段(2010~2020年)。2010年,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0〕7号),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文化生态区的整体保护。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正式颁布,其中明确指出“非遗保护应注重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并确立了区域性整体保护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文化部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办非遗函〔2011〕22号),旨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开展文化生态区的整体保护。通过这一创新性的实践,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146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保护模式成为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特色。然而,部分保护区在规划和评估机制上存在不足,保护目标与地方实际需求脱节,导致资源浪费。

第三个阶段为系统性保护阶段(2020年至今)。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首次提出了非遗系统性保护的要求。^[6]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厅字〔2021〕31号),强调提升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的重要性。相比于整体性保护,系统性保护更加注重非遗与其周围环境的协调统一^[7],强调在非遗保护中统筹考虑文化生态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共存发展。这一理念通过具体政策逐步细化并落地实施。例如,2021年9月发布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厅字〔2021〕36号)明确要求,在城乡建设过程中推动非遗的系统保护、利用与传承,推动非遗融入地方历史文化保护整体框架。2022年8月,财政部发布《中央财政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持方案》(财预〔2022〕112号),进一步提出以生态保护为核心,推动黄河流域非遗资源的整体性与可持续发展。这些政策落实了系统性保护对非遗与环境协调的具体要求,逐渐向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协调性保护模式转变,但与公共文化服务结合不足,非遗的现代化传承路径仍需进一步探索。

(二)非遗合理利用政策进程中的成效与问题

《非遗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条法律将非遗的“合理利用”纳入法治体系,旨在推动非遗经济价值的挖掘,实现非遗产业化利用。^[8]为落实这一政策,2012年2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2〕4号),指出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在生产实践中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从而实现对非遗技艺的有效保护和传承。自此,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分别于2011年、2014年和2024年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共计199个,涵盖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等类别。^[9]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与文化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发改办社会〔2014〕949号),为非遗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了设施建设方面的政策支持。该方案专注于传统表演艺术类、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民俗活动类非遗项目的设施建设,96个建设项目被纳入储备库,其中21个省区的30个非遗设施建设项目获得补助。^[10]2017年4月,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文科技

发〔2017〕9号),进一步推动非遗产业化,利用科技手段优化生产和利用方式,促进非遗技术升级,实现非遗产品的高质量开发。以上种种措施为非遗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推动了非遗相关项目的产业化发展。然而,过度的商品化与经济利益驱动,往往导致非遗文化的深厚传统与技艺无法得到有效传承,部分非遗工艺品沦为商业化的“空壳”。^{〔11〕}这种脱离文化“根脉”的服务显然与非遗的原真性相斥。^{〔12〕}另一项举措是2018年文化与旅游部门的合并,推动了“文旅融合”战略的实施。非遗旅游资源的开发也成为全国各地非遗利用的新方向,以非遗为主题的旅游景区如非遗主题公园、民俗文化村、民族文化村等在各地兴起。这些旅游项目为非遗的合理开发开辟了新的路径,非遗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法律制度不健全、资金支持不足、产业链分散等。^{〔13〕}这些问题制约了非遗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也影响了非遗保护的长期可持续性。

(三)非遗政策助力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成效与不足

前述内容提到,非遗的资源属性在合理开发和利用中逐步显现,在这一过程中,非遗的“文化资本”开始发挥更大作用,逐渐融入国家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以及社区和个体的发展中^{〔14〕},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产业经济领域,“非遗+旅游”已成为地方旅游业提升文化内涵和产品质量的新模式。通过开发非遗特色景区、体验基地、非遗文创产品等^{〔15〕},带动了旅游地居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实现了非遗传承和经济发展的“双赢”。^{〔16〕}例如,浙江东沙古渔镇通过非遗展演、非遗商铺、非遗联展等旅游项目,促进了当地非遗特色旅游产品的销售;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则借助民族非遗资源,形成了独特的“西江模式”,显著提升了当地居民的收入。^{〔17〕}此外,新兴技术如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新媒体的引入,为非遗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注入了新的动力,使非遗产品本身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8〕}例如,虚拟现实技术将传统技艺转化为可视化体验,增加了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在社会服务领域,非遗源自民间,是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不同地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大量民间文化得以融入公共文化生活,促进了当地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19〕}非遗资源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和文明内涵传承了传统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

与可持续发展。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为民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满足了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也正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目标之一。

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非遗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保障,推动了其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引领作用。然而,非遗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地区间存在显著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为非遗项目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能力有限,非遗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成效相对薄弱,导致区域间非遗发展不均衡。在非遗市场化开发过程中,部分项目过度商业化,文化资源被简化为商业符号,削弱了文化本真的体现和长远保护的可持续性。此外,当前非遗政策的监督与评估机制较为薄弱,对资源分配、传承人权益保障以及社区文化生态的潜在影响缺乏有效监控,使得政策实施的长期效益难以保障。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机制亦存在不足,传承人老龄化与年轻一代接续乏力的问题日益凸显,社会保障和资金支持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部分技艺濒危的风险。

(四)非遗政策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成效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致力于构建系统性的治国理政战略体系。^{〔2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涵盖自然生态,也包括文化生态。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以非遗整体性保护为基础,推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对促进非遗保护及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1〕}自加入《保护公约》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非遗保护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在国家层面,制定了《非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在地方层面,截至2023年6月,各地共制定了41部省级地方性法规,87部市级地方性法规,以及81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22〕}这一系列立法成就,不仅为我国非遗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也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3]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一环,非遗保护在调动和传承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发展中华文化、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文化形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 2012 年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为例,该中心通过授课、观摩、讨论等多种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巩固了我国在国际非遗保护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努力对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文化治理领域,尤其是在国家基层社会治理中,非遗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中的善治路径。^[24]自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以来,国家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将非遗传承发展作为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其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为非遗融入乡村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25]202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

非遗政策融入国家治理体系虽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和不足。首先,政策协同机制尚不完善,非遗政策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导致责任边界模糊,跨部门协作和资源整合效率较低,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其次,尽管我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非遗保护法律体系,但地方政策的执行力度和监管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导致部分地区法律法规的落实不到位,非遗保护行动的权威性和一致性不足。此外,在国家治理中,非遗政策与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仍显不足,未能充分挖掘非遗资源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方面的潜力,制约了非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最后,非遗政策在公众参与和社会动员方面尚存短板,公众对非遗保护的认知和主动参与度不高,未能形成全社会广泛支持与参与的治理格局。

三、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非遗政策优化的着力方向

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我国文化事业建设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话语,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措施,公共文化服

务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显现出供需不匹配、服务质量低、供给不均衡等问题。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随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在此基础上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构建了总体框架,明确提出了四项核心原则:以提升文化服务品质为重点,以城乡与区域均衡发展为基础,以开放共享为内在驱动,并以文化与产业融合为发展契机。^[26]这些原则为非遗政策的优化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奠定了政策创新与实施的坚实基础。

(一)推动文化服务品质提升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发展,意味着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应更加注重优质化、多样化和特色化。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公共文化服务需持续丰富内容,提升质量,进而实现服务品质的全面提升。具体表现为:文化服务优质化、服务内容多样化和文化产品品牌化。文化服务优质化指向社会公众提供积极向上、温良包容且符合国家意识形态要求的文化服务,确保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27]服务内容多样化要求优化非遗文化服务的供给结构,避免供给单一化,增强文化产品的针对性,以实现有效的供需对接,满足民众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非遗项目具有多样性和广泛的文化价值,在提供文化服务时,必须根据不同区域和人群的需求,灵活调整文化内容,从而提升服务的整体效果。文化产品品牌化强调在文化服务中树立品牌意识,尤其是凸显非遗文化产品的地域特色,打造具有独特文化 IP 和标志性的文化品牌。许多非遗项目因其地域特性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流变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内核和影响力。^[18]深入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结合现代市场需求,构建优良的文化产品形式,可以快速打造文化品牌。

(二)实现城乡与区域均衡发展

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均衡发展要求优化城乡与区域之间的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城乡和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协调与一体化建设。^[28]如前所述,非遗资源在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源于农耕文明的非遗传统工艺,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还能产出多样化的工艺品,成为带动村民就业、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1]然而,受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等因

素影响,非遗资源在我国的分布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特征。^[29]部分地区非遗资源集中且特色鲜明,而其他区域,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非遗资源相对稀缺或开发不充分。尽管国家实施了《非遗法》规定的区域整体性保护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受限于政策执行的差异和资源调配的不均衡^[30],许多区域性保护仍面临现实困难,阻碍了非遗的均衡保护与传承。不仅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非遗资源和保护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地区出现了人口“空心化”和传承人断层等问题^[31],非遗的保护主体和传承力量在农村地区逐渐弱化。与此同时,城市非遗保护和开发力度相对较大,享有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导致城乡非遗保护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非遗政策必须探索和构建城乡非遗资源和服务一体化的机制,着眼于解决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文化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实现区域和城乡非遗资源的合理调配。统筹城乡与区域之间的非遗资源分配,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推动开放共享,促进社会参与

开放发展要求通过深化公共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管理方式,扩大社会参与,构建开放多元、充满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非遗作为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公益性决定了非遗成果应当是全社会共享的精神文化财富。^[32]实现这一共享的关键在于扩大非遗服务的供给渠道,提升供给的多样性和创新性。目前,在非遗保护和服务供给方面,政府仍是唯一的主要供给主体。^[33]这种单一的供给模式,导致供给效率低下,服务内容缺乏创新动力,难以满足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破解这一瓶颈,非遗政策需要进一步开放,鼓励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参与非遗保护和开发。在新的发展阶段,非遗服务供给主体不应仅限于政府主导,还应吸纳社会组织、企业、文化机构等多方力量,形成协同合作的多元化供给格局。^[34]这种开放的供给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民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推动形成更为高效、灵活的非遗保护和服务供给体系。此外,在非遗产业化方面,开放发展要求建立有利于非遗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化的机制,激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活动。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创新,激发社会公众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增强他们在非遗保护和利用中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只有当公民真正参与到非

遗文化的事业和产业中,并切实体验到非遗文化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非遗政策在开放发展层面,不仅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还需构建能够激励全民广泛参与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体系,确保非遗保护成果惠及全社会,从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四)促进非遗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核心在于在把握各自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旅游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构建出共建共享的文化发展格局。对于非遗保护和发展而言,融合发展不仅是推动非遗创新与传承的关键,也是提升非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非遗融合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逐步形成了多种融合模式,包括非遗与商品经济、非遗与旅游业以及非遗与新技术的融合。这些模式通过创新与资源整合,拓宽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渠道,提升了其经济和文化价值。非遗与商品经济的融合主要通过将非遗中的文化符号物化为商品形式,使其既具艺术价值又具经济价值。例如,非遗手工艺品、传统医药产品等将非遗技艺与现代商品形式相结合,不仅推动了非遗资源的商业化应用,也提升了非遗的经济效益。^[35]非遗与旅游业的融合主要通过旅游项目的开发,利用民俗村、民族村、非遗文化表演等载体,将非遗文化融入旅游产业。^[36]如东北地区的冰雪民俗文化节,依托旅游业带动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和集群化发展,使非遗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形成了“非遗+旅游”的成功模式。^[37]非遗与新技术的融合则通过现代科技与非遗生产的结合,提升非遗传播的广度和深度。^[18]例如非遗工坊利用新媒体和网络直播,将非遗技艺通过在线课程或义卖形式推广。^[38]这种“非遗+新媒体”的模式,不仅拓宽了非遗产品的销售渠道,还增强了公众的参与感,促进了非遗文化的普及和推广。因此,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探索非遗与科技、旅游、文化创意等领域进一步融合发展的途径,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政策保障,显得尤为必要。

四、我国非遗政策优化路径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微观层面、服务供给动力机制的中观层面,以及文化局部与经济社会整体关系的宏观层面进行整体政策框架设计。^[27]非遗政策的优化

必须从这些层面出发,构建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

(一)守好服务质量关,助力非遗品质提升

2021年8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未来十年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了非遗保护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是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制度性保障。^[39]

1. 建立非遗保护标准化体系

非遗保护工作的标准化,是非遗服务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前提,也是保障非遗服务品质升级的必然条件。^[40]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以及《保护公约》等法律法规和已有实践的基础上,必须加快建立一套覆盖非遗认定、保护、管理、产业化的全方位的标准化体系。这一体系应包括非遗项目的认定和保护操作标准、非遗产业化过程中的生产标准以及服务供给的质量标准。建立健全质量监管、反馈和测评机制,确保非遗服务在发展过程中保持高质量水准,不断提升其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27]

2. 完善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非遗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当前非遗政策优化中的一项关键任务。在非遗服务发展过程中,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缺位,许多非遗项目的产权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存在产权侵权和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41]因此,迫切需要出台专门法律法规,明确非遗知识产权的归属及其相关权利,包括专利权、著作权、非遗版权、商标权等。^[42]这些法律应当清晰界定非遗资源的公有和私有属性,明确产权主体和管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合理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43]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能为非遗的市场化发展提供法律支撑,还能有效规范非遗保护工作,促进非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守住非遗服务质量的“生命线”,构建标准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优化非遗政策,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非遗的品质升级,不仅关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更关乎人民文化权益的实现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非遗服务均衡发展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普惠均等、惠及全民。^[44]有效应对并妥善解决非遗区域整体性保护与农村非遗保护发展滞后的问题,已成为

当前和未来非遗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在此背景下,非遗政策应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配置方面加大投入,确保非遗服务在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1. 健全非遗区域整体性保护制度

在非遗区域整体性保护方面,地方政府作为主体责任方,应当积极发挥能动性,提升行政执行力,推进非遗保护工作。首先,地方政府应加强非遗保护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培训与专业教育,培养一支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非遗保护团队。其次,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合理使用保护区配套资金,并通过制定科学的资金管理办法,确保资金使用透明化和高效化。^[29]最后,地方政府应整合跨区域的文化资源,推动设施共享,实现整体性保护区的协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2. 增强农村非遗保护与发展政策支持

在农村非遗保护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农村非遗保护的基础设施投入,建设非遗博物馆、非遗文化档案馆等设施,为非遗文化的展示、传播和保护提供物质保障。此外,还应加大非遗文化和保护知识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的推广力度,吸引更多青年人参与非遗传承工作,解决传承人断层问题。为此,国家和省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金额应向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倾斜,以优化资源配置,为这些地区的非遗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

3. 促进区域协调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区域协调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实践表明,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必须贯穿于区域协调和城乡共进的全过程。加强对薄弱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引进和培养非遗保护人才,加强跨区域管理联动,促进城乡和区域间公共文化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这些措施,有效缓解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不平衡的问题,实现非遗服务的均衡发展。

(三)优化服务供给机制,推动非遗服务的开放共享

在推动非遗服务的开放共享过程中,政府的单一供给模式已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为进一步提升非遗服务的供给效率和创新活力,必须通过政策设计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并借鉴现代治理理论,如网络治理与开放治理,构建起更为高效和互动的供给机制。

1. 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治理机制

非遗作为公共文化资源,其开放共享不仅应依赖于政府的管理,还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企业、学

术机构以及个体的参与积极性。借鉴网络治理的模式,政策应通过建立合作框架,推动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管理非遗资源,确保非遗的开放性与共享性。^[45]设立非遗开放共享平台,汇集非遗保护、开发和市场信息,鼓励社会力量在平台上参与非遗的创新和开发。^[38]

2. 引入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

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数字化转型,非遗服务的开放共享必须引入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对接非遗服务的供需关系;借助区块链技术,确保非遗知识产权的透明性和共享安全性。^[46]可推动建立国家级非遗数据中心,通过科技手段保障非遗资源在共享中的权益与安全性。^[47]

(四)破除管理障碍,推动非遗服务跨领域融合

如果说非遗服务的开放发展侧重于单一领域内的资源开放与服务共享,那么非遗融合发展则强调跨领域、跨业态的整合与协同。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发展理念。随着非遗资源的深入挖掘与开发利用,“非遗+旅游”“非遗+教育”“非遗+文化名城”“非遗+数字化”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跨领域的融合发展已成为非遗服务提升品质与扩大影响力的重要路径。^[48]然而,不同业态的整合发展必然涉及不同管理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传统的条块分割式管理模式使各主体单位或机构的职能过于分散,导致数据资源流通不畅、业务流程衔接困难、管理运行复杂等问题^[49],因此,必须从政策层面破除管理体制中的制度性障碍,推动跨部门协同与资源整合。

1. 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

非遗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发展需要多部门的协调合作,尤其是文化、旅游、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资源整合。可成立跨部门非遗融合发展协调委员会,通过政府、企业和文化机构的协同合作,推动非遗服务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同时,通过联合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确保非遗资源在不同领域间的互补与协同效应。^[50]

2. 进一步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非遗与旅游业的融合已成为非遗服务创新的重要方向。应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战略,支持地方政府开发以非遗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和体验项目,打造具有文化特色的旅游线路。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参照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设立非遗主题旅游示范基地,提升非遗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探索非遗与其他业态的整合机制

在其他领域,如“非遗+教育”“非遗+数字化”等融合业态中,也应打破各部门间的体制壁垒,实现教育、科技等部门与非遗管理机构的协同合作。例如,鼓励将非遗课程纳入中小学、大学和国际文化教育体系中^[51],并通过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创新非遗的展示和传承形式。设立专项支持计划,开发非遗数字化体验项目,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将非遗资源的传播推向新的高度^[52],吸引更多年轻群体的参与。优化管理模式,促进多方协作,使非遗服务更好地融入国家整体文化与经济发展框架,形成可持续的融合发展机制。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已逐渐融入国家战略发展,成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非遗政策的优化应更加注重多学科理论的融汇与实践结合,特别是借鉴公共管理领域的最新治理理论,如“网络治理”“开放治理”与“界面治理”^[53],促进多元主体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同时,非遗政策的优化还应推动非遗与科技、旅游、教育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构建更加灵活、开放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未来,非遗政策必须突破传统的条块管理模式,充分发挥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机制的作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智能化和现代化建设。政府应继续完善非遗保护的标准化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倾斜与基础设施投入,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引导,使非遗政策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全球传播。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menuid=197, 2024-09-27.

[2]柯平,彭亮.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十五五”战略规划的思考[J].图书馆论坛, 2025(1).

[3]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文艺研究, 2008(2).

[4]丁元竹.“十四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相关政策措施研究[J].管理世界, 2020(11).

[5]黄涛.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角色的定位偏误与矫正[J].文化遗产, 2013(3).

[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2024-09-27.

[7]全小国,苑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研究[J]. 东南文化, 2023(4).

[8]黄永林,李媛媛. 新世纪以来中国非遗保护政策发展逻辑及未来取向[J]. 民俗研究,2023(1).

[9]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EB/OL]. <https://www.ihchina.cn/project.html>,2024-09-27.

[10]罗微,吴昊,韩泽华. 2014 年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研究报告[J]. 艺术评论,2015(4).

[11]马知遥,刘垚瑶. 乡村振兴与传统工艺类非遗保护和发展路径研究[J]. 文化遗产,2020(2).

[12]庾祖海.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及其评估现状论析[J]. 学术论坛,2024(2).

[13]杨亚庚,陈亮,陈文俊,等. 论宜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J]. 河南社会科学,2014(1).

[14]周茜茜,萧放. 遗产与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本的当代实践[J]. 文化遗产,2023(1).

[15]妥学进.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文化遗产保护方向[J]. 文化遗产,2023(1).

[16]廖四顺.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高质量互动发展[J]. 社会科学家,2024(2).

[17]田磊,张宗斌,孙凤芝.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融合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21(5).

[18]黄永林,纪明明.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文化产业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3).

[19]韩成艳.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J]. 思想战线,2011(3).

[20]王建国,包安. 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体系的构建[J]. 社会主义研究,2018(1).

[21]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22]王云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重要精神及其对完善中国非遗法治建设的启示[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2).

[23]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4]杨洪林,顿山.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乡村振兴的文化治理转向[J]. 文化遗产,2022(3).

[25]黄永林,任正. 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26]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23/content_5595153.htm.

[27]彭丽丽,彭松林. 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政策渊源、概念内涵与着力方向[J]. 图书馆,2024(3).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4-09-27.

[29]张志颖.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 中国实践——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效与问题探究[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30]陈志娟,李治.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2022(5).

[31]朱华. 非遗保护视角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创新路径[J]. 农业经济, 2023(12).

[32]马知遥,刘智英,刘垚瑶.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几个关键性问题[J]. 民俗研究,2019(6).

[33]刘辉,张蕴甜. 文化治理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J]. 东南文化,2017(2).

[34]孔繁斌.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35]王勇.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要走产业化发展之路[J]. 人民论坛, 2019(2).

[36]黄永林,邹蓓. 推动非遗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主要路径[J]. 文化遗产,2024(1).

[37]张继焦,侯晓晨. 从习俗和非遗的冰雪节日到冰雪产业化文旅融合发展[J]. 贵州民族研究,2024(4).

[38]王凤蛟,石慧昌.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特点及进路——基于 30 个典型案例的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2024(7).

[39]王霄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标准若干问题探析[J]. 文化遗产, 2022(5).

[40]王霄冰,胡玉福.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体系的建立[J]. 文化遗产,2017(5).

[41]聂鑫.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及其边界研究[J]. 文化遗产,2023(3).

[42]王晨阳,刘魁立,朝戈金,等.“非遗保护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笔谈[J]. 民俗研究,2023(6).

[43]曾礼.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权保护的法律逻辑——以民间文学艺术产权为中心[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2).

[44]李斯.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与未来展望[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4(5).

[45]赵新峰,王鑫. 雄安新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何以实现——合作网络视角的分析建构[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3).

[46]郑荣,张薇,高志豪.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构建与运行机制研究[J]. 情报科学,2022(5).

[47]张振鹏. 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供给数字化运营机制[J]. 山东社会科学,2022(2).

[48]黄永林,程秀莉. 保护传承各民族非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

[49]张龙. 从动员型管理到“内发-协作型”治理:非遗保护的范式转换[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

[50]徐传湛,王艺璇. 旅游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融合:一个综述[J]. 经济体制改革,2018(3).

[51]刘垚瑶,马知遥.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探究[J]. 华文教学与研究,2024(3).

[52]吴佩琦.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践[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7).

[53]李文钊. 界面理论范式: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统一分析框架建构[J]. 行政论坛,2020(3).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